

汉语词汇的发展阶段及其演进机制

姚 森

四川省成都市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

摘 要 汉语是中华民族历史传承的重要瑰宝,也是承载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。汉语词汇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,即,单义词、多义词、派生词以及双音词阶段。其中,单义词过渡到多义词的发展,主要经历了词义的离析、移植以及延伸等。在词义发展中,词义离析将单义词汇表达意义分成两种表达意义。词义移植基于共通性或关联性,在旧词汇中融入新的词语意义。而词义延伸,即在实际应用中,由于搭配词语的影响而延伸形成的新词义。从多义词到派生词的转变,主要经历了语音与字形的派生过程。其中,前者是将原词音节中的一些因素进行改变,从而派生出新的词汇;后者基于字形主要划分成两个类别,即有承继关系与无继承关系。

关键词 :汉语词汇史;汉字;出土文献;发展阶段;演进机制

纵观近年来对汉语词汇的研究,主要集中在纵向与横向层面,前者属于基于问题的研究,是历时语言学研究范畴,也就是侧重研究汉语词汇的发展历史,一般集中在经历的发展时期、界限与机制等方面。后者属于基于内容结构的研究,是共时语言学研究范畴,主要围绕汉语词汇的发展时期所涉及的内容研究,侧重于内容的合理结构。

自汉语词汇发展至今,针对两个方向的研究始终没有停息,但通过调查发现,纵向研究方向涉及的较少,发展面貌还不够明确,诸如汉语词汇的分段情况,当前的研究在概念叙述上还比较模糊,多数研究学者更加愿意用历史朝代作为汉语词汇的划分界限。众所周知,朝代的兴衰存亡,未必会有语言的重大转变,换句话说,朝代的更迭史与汉语词汇的发展史未必是同步进行的。纵观各方研究来看,语言发展的巅峰多数是一个朝代的繁荣时期。针对汉语词汇研究需要侧重于探索其本身重大发展的阶段性特征,并将其作为分段依据,来展开机制上的探究。传世文献,也就是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,因为在传抄中,为了便于理解,而经历了词汇的替换,因此,只应用传世文献来对汉语词汇发展史进行研究还是不够准确的。近些年,各类出土的文献已逐渐发展成比较全面的时代序列,由此为研究汉语词汇发展历史做好了铺垫。

本次研究主要基于出土文献,围绕传世文献对汉语词汇发展史与演进机制。但同以往有所不同的是,文章主要基于书面语层面展开研究,其中,语言和汉字是无法分割的,其他研究可能会在总体上脱离文字。针对书面语言来说,能被称得上完整的词汇,必须要具备三个要素,即词义、词音与字形,其中,词义代表词汇的内容,包含音节与字形两种形式。但在口语研究方面,主要涉及两个要素,即词义与词音,以书面语来说,因

为汉字字形的区别,派生成的新词汇,若排除字形,那么原有词汇就不会发生改变,因此,两个层面的研究还是有极大不同的。

一、汉语词汇发展史与演变机制

汉语词汇的发展史经历了单义词到多义词的演变,又通过发展生成派生词,进而演变成双音词,这四个阶段,业界通常称之为四阶递进发展。

(一) 单义词发展

汉语词汇,是古往今来大众用来描写与称呼事物或现象的,在词汇形成的初始时期,通常会将一个词形用相对应的事物或现象来表示,因此,在此期间相继涌现了大量的单义词。其发展经历的重要阶段主要集中在商、周两个朝代。业界相关人员研究显示:甲骨文涉及的词汇就高达1400多个,而单义词就有1200多个,高达80%以上,剩余的词汇为多义词。另据业界相关人员研究显示,西周时期的金文总计1500多个,而单义词接近1300个。

汉语词汇中的单义词在发展过程中,达到一定程度,势必会面临一些问题,例如,音节是有一定数量的,继续发展势必会涌现许多同音词,从而影响到正常交流;音义与词义的系统性不足,以往形成的词汇,在音义方面基本是约定俗成的,简单来说,即在音节与词义之间的预测与联想缺少理论依据,紧靠死记硬背才能形成深刻记忆,为人们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。“约定俗成”一词精准呈现了音节与词义关联的约定性。也因此,同音词能够表达很多毫无相关的意义,汉语言中也就生成了一些与意义没有关联的同音词汇。但相似的词义又能够通过不同音节表示,汉语言中也就生成许多义同音不同的词汇。这也就阻碍了单义词数量长远发展的可能,在大众发现这一现象时,就会不断探索词汇发展的新路径,这也就衍生了多义词^[1]。

（二）多义词发展

汉语词汇中的多义词，属于同一个词形代表多种词义，这种一词多义的词汇不仅使许多词形被节省下来，从而防止与缩减了同音词的持续增加，而且，能够建立系统性词汇，更加方便人们记忆与理解词汇的意义。多义词的许多词义之间，即存在一定的假借义，还存在大量的意义关联性，如此，词汇的意义就形成了系统性，也就为人们便于记忆与理解奠定了基础。在甲骨文时期的词汇方面就出现了一些多义词，这也就说明，在商朝，汉语词汇就有了多义词的发展，然而，在此期间的单义词占据主导，多义词义位数量不多，由此可大致判断，商朝属于多义词发展的初级阶段，而其发展的繁荣时期处在春秋时代。

汉语词汇中的多义词并不是无限制的发展。第一，同义词汇蕴含的意义不能过多，否则会很难辨识，甚至会有错误的情况出现。第二，多义词中的义位之间不可太过接近，也不能间隔太远，这与多义词的特征不相符，这也就导致多义词中假借义在不断发展中演变成不同意义的词汇。因此，多义词演进到相应程度后，就需要有新的词汇产生，

多义词主要围绕词汇内容的发展，若已经无法推动内容的发展，那么就要在词形方面下功夫，由此也就衍生了派生词。

二、汉语词汇初始阶段产生的方式

汉语言中所提到的词义即指人们用来划分和概括主客观世界的，两个世界中的事物与现象一部分属于具有较强独立性的个体，还有一部分具有较强的联系性与统一性。语言的分割程度，会在范畴上存在差异，针对汉语初生词的词义而言，可划分成两个类别，即点状词义和区块词义。前者的词义是最小又无法分割的单位，多数名词都在此范畴。后者的词义属于一个关系组，处在小范畴中，举例来说，汉字“受”，在甲骨文中，从字形上来说，上手+盘+下手，代表一人递出盘子，一人接收，表示二者之间物体的传递。在《说文部首》中有提到：“受，相付也。从，舟省声。”与其相近的字还有“澡”字，《说文·水部》中有提到：“澡，洒手也。从水，臯声”，也就是中间是一只右手之形，其中的六个小点像水，表示用水洗手的意思。两种词义存在的差异性，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在汉语词汇的初级形成时期，人们没有统一标准化事物或现象的分割所导致的。在词汇系统严谨化以及精细化发展下，势必要离析区块词义，从而确保词义划分具有标准化的支撑^[3]。

三、汉语词汇中多义词的生成路径

（一）汉语词汇中词义的离析

所谓词义的离析，即指词义在演进中，将一个词义生成两个词义，其中，区块词义是所要离析的目标，这是词义发展形成标准化与精细化的结果。同样以“受”字来说，将授予与接受彼此间进行传递的词义通过离析，形成授予与接受两种词义。词义离析涉及两个方面的结果，其一为通过离析后的多种词义共同存在；其二为通过离析后的专门意义。以“启”字来说，其通过离析，只剩下“开”，去除了“门”。所产生的结果，通常受词义系统决定，简而言之，若词义不同，就两个词义共同存在；若相同，就会有脱离。分化派生的字形是词义离析的显著标志，然而，字形分化派生之前，就有了词义离析，其分化派生属于发展后产生的结果^[4]。

（二）汉语词汇中词义的移植

词义的移植主要依据共通性与互联性，将新的词义以旧词表达，也就是将新义引入到旧词内。这属于多义词生成的关键路径。举例来说，汉字中的“西”字，用甲骨文表示后，属于象鸟巢形，而在用小篆表示中，象鸟在巢上形，其本质意义是飞鸟栖息。“棹歌惊起乱西禽，女伴各归南浦。”就运用了“西”的本义，即飞鸟在夜晚归巢栖息的时候，也就是夕阳西下之时，二者有很大的联系，因此，在汉字“西”字中，就有了“西方”词汇的移植，从而以“西”来表达。

除此之外，在上古的汉语中，常常会出现名动同词的情况，也可能是词义移植所引起的。举例来说，在《说文·立部》中就有对“立”字的表示，即“立，住也。从大立一之上。”古文上的解释为形体象人体正面立于地上之形，本质意义代表站立。通过长久的发展，延伸出“所立之处”的词义，比如，“人行而鬼当道以立，解发奋以过之，则已矣。”就是其代表。针对既有的文献材料来看，汉字中的“位”字，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的包山楚简与郭店楚简之中，其中所表示的意义都是“莅”，举例来说，在《包山楚简·卜筮祭祷记录》中就提到过“臧敢为位，既祷至（致）命。”同时，在《郭店楚墓竹简·老子丙本》中也涉及到“则以哀悲位（莅）之，战胜则以丧豊（礼）居之。”

四、汉语词汇中派生词的演进方式

（一）汉语词汇中语音的派生

所谓的语音派生，就是在将原有词汇音节中的部分因素进行改变，从而形成新的词汇。出现语音派生的情况，清代学者对此有多方面的论述，举例来说，针对汉语词汇中的“賁”字，在《说文·贝部》中，就有该汉字的下段玉裁注，也就是“古无賁、贷之分，由賁字

或作贷，因分其义，又分其声。如求人曰乞，给人之求亦曰乞，今分去乞、去既二音。”

在当前广为流传的训诂经注就是在汉朝产生的，也就是说此类情况最早是由汉朝人所记录。这种产生与记录的现象属于两种情况，大众更为相信汉语词汇中的音变派生肯定是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存在，只不过是口语中被涉及，在经注涉及不足的程度下，极难被获知，但值得庆幸的是字形派生属于显而易见的，都属于多义词派生的方式，在起源方面应该是差别不大的，或者，能够凭借字形的派生来推断出音变派生的起源与发展的时期。语音派生一部分仅仅使声母者发生了改变，一部分使韵母者发生了改变，同时还涉及到变调者的改变以及声韵调均涉及到的改变。该角度从一定意义上来说，到目前为止已经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，所以不做过多的阐述^[6]。

（二）汉语词汇中的字形派生

1. 狭义角度的形体派生

这种派生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式：

首先，异体汉字的职能分配，也就是将既有的属于一字异体的形体通过确立，形成不同字形来对既有的以一个字形承担的词义进行分担。举例来说，针对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字形中能够得到，“阵”这种异写形体应该表示为“陈”字，后来承担了战阵含义，从而形成新的不同含义的词汇。而汉语词汇中的“奈”这种异写形体应该表示“柰”字，在分担后有了奈何的含义，从而生成不同含义的词汇。

其次，构件的增加。即在既有字形上对新构件进行添加，从而形成新字形，对原有字形所代表的词义进行分担，构件增加的方式属于汉语词汇派生的最具代表性的。举例来说，汉语词汇中的“賣”字，其在“買”字之上对“出”这一新构件进行了添加，从而对离析形成的词义“卖方行为”进行分担，在《说文·出部》中就对“賣”字有所提及，即：“賣，出货物也。从出，从買。”针对现存的资料和研究来看，这个字应该是在秦灭六国，大一统后形成的，并且这种情况一旦产生就严格分工，因此，其应该属于秦朝“书同文”在对文字

整理过程中所新创汉字。在秦大一统之前，“買”不仅代表买，同样代表卖，举例来说，在古文中就曾有“其乘服公马牛亡马者而死县，县诊而杂買（賣）其肉，即入其筋、革、角，及索入其贾钱。”的涉及。

最后，构件的改换。所谓的构件改换，即以新构件将既有字形中的部分构件进行替换，从而将既有字形所代表的含义进行分担。举例来说，古代《说文·示部》中就对汉字“柴”有所解释，即“柴，烧柴焚燎以祭天神也。从示，此声。”据各类文献显示，“柴”字多会用在柴祭上，例如在“柴于上帝。”以及“谓燔柴以告天。”中所提及的，柴祭将烧柴作为其重要特征，因此，初始时期仅用汉字“柴”字来表示，这就属于“柴”字的引申义。逐渐进行了偏旁的改变，将“木”替换成“示”，从而派生出“柴”，发展成柴祭专门应用的汉字。

除此之外，针对汉字笔画发生改变而形成的派生字形，其涉及的研究材料还比较少。部分文章中将“母和毋”、“王和丰”、“刀和刃”等作为笔画改变形成的派生字，但通过各方面资料的查阅，对其给予了否定，其一定是要创造出能够将笔画改变的字，同时能够及时在功能方面进行区别，此类情况仅能通过人为规范才能够得以实现，仅在汉字形体的自然发展与演进中是很难形成的^[7]。

2. 广义角度的形体派生

创造和既有形体不发生联系的新字，此类情况在我国汉字系统的自然演进中是极难见到的，部分通过人为强制性创造的诸如武周新字，

也仅仅是昙花一现的存在。在《颜氏家训·杂艺》中就多有提及，其中所涉及的诸如以百念为“忧”、不用为“罢”、更生为“苏”等北朝新字，也没有了太多的活力。这就代表汉字的派生，具有字形与字用延续的规律，对字的形体进行截然的分断与一般性规则是背道而驰的。在部分论述过程中总会有这样的例子出现：诸如“亦”和“腋”的派生，但在事实上是有很大误解存在的，“亦”和“腋”没有直接性联系，汉字“亦”属于先通过汉字“夜”的借用，接着再以“夜”为基础形成“腋”字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王贵元. 从出土文献看汉语词汇研究的问题与前景[J]. 复旦学报: 社会科学版, 2016(03):12.
- [2] 吕伟. 战国至秦代词汇研究[J]. 山东大学, 2011

(03):11136-1137.

- [3] 陆杰. 汉语词义和词汇系统的历史演变研究——以“掠”为例[D]. 上海师范大学, 2017.